

# 彭真和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 工農生產及城市建設（1958~1960）\*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 摘 要

中共「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危害已眾所周知。「文革」前跨足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彭真，如何投入此一運動的問題，現有相關文獻較少聚焦在他擔任中共首都領導人的角色和活動，亦即其如何領導和管理北京市的「大躍進」運動，以及造成的政策影響。本文指出：在京畿農業和工業「大躍進」上，彭真親自開會鼓吹農業高產指標，動員投入大煉鋼鐵行列，並藉機發展當地的有關產業。在城市建設上，彭真戮力準時完成中央交付的首都「十大工程」任務，既為國慶十周年獻禮，也為「大躍進」宣傳和助陣。無可否認地，彭真在運動期間亦有成效不彰、可資爭議的市政規劃和舉措。彭真在北京市推行運動不遺餘力，致使中共的首善之區也出現了欲速不達的弊病和缺糧饑饉的危機。彭真晚年回顧相關歷史時，因為「十大工程」的正面聲譽和影響，特別重視記述其自身對之的指導。

關鍵詞：彭真、北京市、大躍進、十大工程

\* \* \*

## 壹、前 言

彭真（1902~1997）在「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和歷史中，扮有一個特殊的角色：他既是參與黨國重大決策並職司執行的中央要人（最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領導人），也是長期擔任中共首都北京市黨

---

\* 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001-MY2）。

委第一書記、市長的地方要員。

對於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起、肇禍極大的「大躍進」運動（實行時間為 1958 年至 1960 年，內容包括「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因此又被稱作「三面紅旗」運動），彭真也積極參與其中。1994 年 10 月 17 日，彭真以「老領導」、「老父母官」的身分，接見北京市鋼鐵工業的龍頭企業首鋼總公司（其前身為石景山鋼鐵廠）的負責人時，回顧相關歷史就表示：

「大躍進」，當時就是想搞得快一些，又沒有經驗，主要是我們領導腦子發熱。群眾腦子發熱，領導腦子不發熱就行了。所以說，「大躍進」的錯誤，我們當領導的有責任，包括毛主席在內。當然，我也包括在內，那就不在話下了（首鋼總公司黨委組織部黨史辦公室 2002, 130）。

然而，關於彭真如何具體領導北京市「大躍進」運動的問題，在現有的中、西相關文獻中，皆仍有尚待開發、深究的空間。中共官方編寫的《彭真傳》的有關章節，描寫彭真以中央領導人的身分參與「大躍進」的情形（如指揮大煉鋼鐵運動），也選擇性地談及他過問北京市當地運動的片段情況。彭真的官方傳記強調其傳主因為實際參與運動的發展，知道相關政策存在的問題，所以頭腦很快地就冷靜下來（《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955-996）。西方唯一一本彭真的英文專著，在提到「大躍進」時，認為彭真注意組織運作、規範程序；毛澤東則喜好不受拘束，偏好訴諸群眾運動。彭真雖然負責執行「大躍進」政策，但對毛的相關主張心存保留。等到運動開始降溫後，他即順勢緩和運動的發展（Potter 2003, 83-84）。

新近發表的一篇關於彭真在「大躍進」中的角色的英文論文，探討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如何在中央層級強力指揮 1958 年的全國大煉鋼鐵和 1959 年的「反右傾」運動，以及他在北京市進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實驗：安排農村公社試行全民所有制過渡，也積極籌建城市公社，期以創造典型經驗，讓中央採納和推廣（Chung 2015, 129-143）。此文推翻了彭真對毛相關運動政策醒悟較早或是有所保留的觀點；但是它對於本文欲詳加討論的「大躍進」期間彭真對北京市地方農業生產、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領導情況，則寥寥數語帶過甚或是全無探討。

彭真如何在北京市執行「大躍進」「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的核心主張，以及藉勢發展首都工業和打造城市建設？他所持的政治態度為何、有何具體作為？其又造成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和影響？本文使用近年來蒐集、累積的中共官方檔案、內部情資報告、年譜傳記、回憶資料、「文革」批判資料以及訪談資料，嘗試回答以上的問題。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掌理北京市工作時，信從中央領導和政策，同時希望該市能在全國工作中位居前列，名副其實地作為領先帶頭的一國之都。彭真的相關理念也具體體現在他對首都「大躍進」運動的領導和管理。在農業和工業的「大躍進」上，彭真冀望北京市盡己所能地參與仿效、做出貢獻。為了向中共十周年國慶獻禮並展現「大躍進」的速成精神，彭真也不辱中央使命短期完成所謂的「十大工程」。在此

背景下，「大躍進」欲速不達、弊病叢生的後果，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市也不得避免。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試圖重建彭真在「大躍進」期間指揮中共首都相關運動的角色和活動，冀以對彭真個人的政治意向、他在「文革」前對北京市的政經管理，以及中共相關歷史（特別是政治史、地方史，還有「大躍進」時期的城市發展）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分別介紹彭真對北京市推行農業「大躍進」、工業「大躍進」，以及興建國慶建設等工程的與聞情形和看法主張。在結論先扼要綜述彭真在首都「大躍進」中的主要作為和政策影響，最後簡要探討彭真晚年如何處理相關歷史，以及本文如何增進對若干中共重要歷史問題的了解。

## 貳、助長市郊農業「浮誇風」

### 一、力圖跟上農業「大躍進」形勢

中共中央在 1958 年發起「大躍進」運動，乃基於對農業大幅成長和潛力無窮的置信。在「大躍進」醞釀之時，彭真對北京市的農業生產一開始也表現得頗為積極。1958 年 2 月 23 日至 26 日，北京市委舉行農業勞動模範、積極分子大會，以及市、區、鄉、社四級幹部會議。相關會議的召開，被指稱是為「郊區農業拉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7, 156）。根據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2 月 27 日的報導：彭真在 26 日閉幕會上對 2,000 多名與會者表示：「把整風堅持到底，大家徹底打掉官氣、暮氣、闊氣、嬌氣和驕氣，開展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群眾運動。大家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哪裡先進就要向哪裡學習。努力為爭取提前實現四十條綱要而奮鬥。」所謂「四十條綱要」指的是《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彭真更具體要求各區開展生產競賽，以畝產糧食「過黃河」、「過長江」為目標，亦即按「四十條綱要」的要求，畝產達到或超過 500 斤或 800 斤以上，甚而爭取成為「千斤社」（《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291-292）。彭真此時為北京市農業「大躍進」「拉開序幕」，無疑與 1958 年 1 月至 2 月毛澤東在中央高層厲聲反「反冒進」、批評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政治情勢直接相關。彭真希望在農業上以具體的規劃和行動，證明其自身和治下的北京市欲打破「反冒進」「保守」、搶當「大躍進」「先進」的決心。

然而，在之後短短的數月之內，農業要大躍進、大發展的聲浪，在全國各地一波接一波，糧產數字被越抬越高，畝產數千斤已不足為奇，甚至出現了號稱畝產上萬斤者。在此背景下，彭真對北京市農業提出的「過黃河」、「過長江」、「千斤社」的目標，相形就顯得保守和過時。

在各地農業生產指標急遽攀升的過程中，負責主持全國農業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不但對此樂觀其成，更進一步地在其中

鼓吹和加碼。譚震林也將其目光投注到北京市的農業狀況。因為 1958 年的小麥夏收情況，北京市據實呈報畝產 130 斤，在全國各地上報的夏收畝產排名中敬陪末座。譚震林決定對北京市當面施壓，促之盡快跟上。7 月 4 日，譚震林出席北京市郊區區委書記會議，批評北京市農業跟不上全國「大躍進」的形勢，更對郊區農業提出具體要求——要滿足北京市全部副食品的需要，以及 1959 年沒有低產作物（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7, 216-217）。根據當時北京市委人員的回憶，譚震林甚至還批評：「你們上不上？你們明年的產量究竟是多少？如果你們沒有一個數字，那麼我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後來譚震林乾脆到市委找彭真談話（張道一 2013, 166）。

譚震林的黨內地位在彭真之後，彭真從 1945 年起就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則要到 1958 年 5 月 25 日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才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在 1956 年成立的中央書記處人員排名中，彭真、譚震林也分居第 2 位和第 4 位。譚震林在 1958 年夏之所以膽敢向彭真領導的北京市施壓，可能原因有：譚震林主管農業，他要求北京市的農業抬高生產指標，乃在其職權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按照毛澤東「以糧為綱」的「大躍進」構想，以及他在「大躍進」伊始時拔擢譚震林升任政治局委員的人事安排，即是要譚震林在糧食高產上大作文章、好好表現。易言之，譚震林就北京市的農業問題向彭真和北京市委施壓，在工作上既師出有名，政治上也有所憑藉。

對於當時全國各地震天價響的農業「大躍進」戰績和氛圍，以及譚震林對北京市農業生產情況不佳的批評，彭真不免也受到影響和感染，開始心浮氣躁。彭真一方面對全國農業大增產、大豐收的消息加以盛讚（《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967），甚至對到北京學習的解放軍將領表示：「吃不飽」、「吃不好」的時代過去了，在北京「儘管吃就是了」（邱會作 2011, 336）。另一方面，他回頭批評北京市的農業「幹得不好」、「實際是下游」（滿運來主編 2002, 84）。

其次，1958 年北京市先後合併了河北省的 9 個縣，大幅擴增農業人口和農副產品的供應基地。郊區農村人口從 80 餘萬激增至超過 281 萬，耕地也從 210 多萬畝擴大三倍多，累積至將近 740 萬畝（趙凡 2003, 66）。隨著郊區農地的擴大和農業經濟規模的加大，發展京郊農業成為彭真責無旁貸的一件工作。他或許也想借助譚震林之力，驅動北京市創造農業「大躍進」。7 月 28 日，彭真主持召開北京市農業會議，譚震林出席講話。譚在會上表示：「北京不管種什麼，都要全國第一。」他批評北京郊區一些地方莊稼種得不好，更直指市委的農業官員「幹勁不足、火力不夠，是下游」（《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25）。

此外，促使彭真積極行動、改變局面的原因，當然還有毛澤東。8 月 13 日，毛澤東行經北京市郊時，順道參觀當地的農業生產情況。毛在參訪過程中明白顯露出他對農業高產的好感和期望（趙凡 2003, 69）。彭真麾下的北京市的農業，若再不思振作，真的可能淪落為全國農業「大躍進」中的「尾巴」，不符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讓他在毛的面前臉上無光。彭真想到的辦法就是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政治動員。

## 二、召開農業動員大會

爲了開好農業動員大會，彭真在 8 月 13 日召開北京市各區（縣）黨委書記會議（《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27）。彭真在會上表現出他的急迫心情：「郊區的糧食產量不高，今年小麥每畝平均產量搞了 130 斤，這怎麼行呢？搞個群眾路線，大家討論討論。」（《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973）彭真決定親自上陣領導群眾。8 月 17 日，北京市委在天壇公園召開農業「大躍進」誓師大會，與會的市、區、鄉、社幹部計達 15,000 人。彭真到會講話，將會議氣氛帶上最高峰。彭真表示：在「總路線」下，「全國鼓起幹勁以後」，「和全國先進地區比較，我們郊區比較落後」。他更直言：「壞事就是今年郊區比較落後，咱們北京這麼多黨員、團員、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就甘心落後嗎？不行！大家看到莊稼長得不好，地頭上插白旗，心裡舒服嗎？別說你們不舒服，我看了都不舒服。」彭真呼籲要做好 1958 年秋收前的田間管理，也要大舉投入 1959 年的小麥種植。他強調：「明年再不能搞中游，要爭上游。」（彭真 2003, 702, 705）

如何使小麥增產？根據《北京日報》次日的報導，彭真列舉的措施都不外乎當時風行、但後來證明未必有效的「農業八字憲法」，包括：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深翻土地、多施底肥、密植、選用優良麥種等。彭真進而強調要破除對農業「操作規程」的迷信，認爲只要能「使我們多快好省地增產的」經驗和措施，就應採用和發揚。他還建議每個區、社、隊、組都要培植試驗田。

關於小麥畝產的指標，彭真在會上鼓動各區、縣書記要「消滅一二三（千斤），爭取四五六（千斤）」。

針對昌平區委書記張俊士所提的畝產 3,000 斤的規劃，彭真當眾予以難堪。他對張俊士表示：「爲什麼別人都消滅了一二三，你還有 3,000 斤？最後是坐飛機還是當烏龜你自己考慮。」在衆目睽睽的巨大壓力下，張俊士不得不當場表態保證畝產 4,000 斤。相對地，順義縣委書記宣稱要畝產 10,000 斤，彭真就立即點名表揚（彭真 2003, 706）。

根據時任北京市農業工作負責人趙凡的回憶，彭真還提出：「砍掉右傾保守，樹高產思想，力爭郊區農業站在全國最前列！」在彭真的鼓動兼施壓後，「大會的氣氛越來越緊張熱烈，群情振奮，口號連天，躍進的調子越來越高，生產指標越報越高。」（趙凡 2003, 70）彭真的舊屬後來也不諱言：「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假大空』大會。」（張道一 2013, 166）

在農業增產問題上，相對於頭腦開始失去理智的彭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倒是保持著一定的清醒。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員後來即評價：「當時北京市的幹部中，思想狀態並不那麼清醒的大約是多數。市委的領導人中，也許只有劉仁是心裡最有數的。」（張道一 2013, 165-166）農業「大躍進」誓師大會舉行之時，劉仁因外出而無與會。劉仁得知此會在彭真的操作下出現了罔顧實際的高估產、高指標的現象，就向彭真提出異議。彭真聞後請劉仁召集市委常委會研究，之後彭真指示市委農村工作部通知各縣、

區，根據自身的情況重新訂定農產計畫（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 2000, 381；鍾延麟 2015, 133）。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彭真在天壇農業「大躍進」誓師大會掀起的農業估產「浮誇風」，一旦被鼓譟起來，一時也難以制止，甚至在農村基層間持續發展和蔓延。《北京日報》後來就先後報導周口店試驗田畝產 10,000 斤到 100,000 斤、通縣永樂店畝產 32,000 多斤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2011, 215）。《北京日報》放出這兩顆農業「高產衛星」，沒有事先經過彭真為首的市委領導同意，恐怕也不太可能。

更何況彭真雖然「要各地根據自己的實際定」糧產指標，但是他仍繼續公然表露對北京市農業豐產和高產的殷切盼望。天壇農業「大躍進」誓師大會後的半個月，9 月 2 日，彭真在市委常委會議上依舊指示：「農業產量，明年要大躍進，各種農作物，特別是道路兩旁要有大面積的豐產田和小面積的高產試驗田。」（《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32-333）北京市的農業官員和幹部見到彭真這種偏好「數大就是美」的態度，他們在設定糧產指標時，縱使不會漫天亂喊產量，也知曉要多多益善才保險。

### 三、《前線》發刊詞發表後的熱度猶存

1958 年 11 月 25 日，彭真為北京市委主辦的理論刊物《前線》撰寫發刊詞〈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這一發刊詞從題目到內文，都寄託了彭真對北京市工作的指導理念和深切期盼。親近彭真的著作和人士，經常援引其中的文字：

我們要改造現實—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可是我們卻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憑靈機一動的「本能」辦事，不能按照片段的材料和表面現象辦事，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即跟著空氣辦事。總之，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亂幹（彭真 1992, 254）。

藉以強調當「大躍進」運動「還在勢頭上」，「主觀唯心主義和『左』的思想傾向還很嚴重」，彭真就「鮮明地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989）。但是相關說法忽略了毛澤東從 1958 年 11 月初以來即開始思考對「大躍進」稍微降溫的政治動向，而彭真對此知之甚詳，也掌握到可以略為「唱低調」的政治時機。另外，參照彭真接續對北京市農業的指導言行，更可顯得相關說法的言過其實。

1958 年 12 月 19 日，彭真在接見羅馬尼亞大使時饒有信心地指出：關於 1958 年全國的糧食產量，「我們 7,500 億斤的估計是可靠的，可能還會多一些」（後來經核實後總計約 4,000 億斤，浮報了 3,500 億斤）。另外，彭真表示今年的農業豐產只是典型試驗，明年將全面推廣；他以北京市為例，認為市郊的大部分土地在今年經過深翻土和密植後，「明年的麥子就會長得好些」（彭真 1958b, 4）。事實上，同年彭真即曾派一位秘書，在八寶山附近找地進行深翻土、密播種的生產試驗，並獲知實驗效果不濟（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1 年 7 月）。

1958 年底，彭真也大張旗鼓地延請 17 個省市的農業勞動模範（計 202 人），留駐

北京市協助高產試驗，並願意提供、滿足其生產所需的條件和物資。這些勞模卻在 1959 年初就紛紛求去，此事最後也不了了之（新華通訊社編 1959a, 18-20）。彭真從中自應多少可以察覺：各省農業勞模和各地高產捷報的存有不實。然而，中共中央在 1958 年底對 1959 年全國糧食產量所設定的目標，高達 10,500 億斤（最後實收約 3,400 億斤，僅及其 1/3）。彭真對此異想天開的離譜數字不但沒有異議，在 1959 年 3 月還指示北京市要按之承擔糧食生產任務（彭真 2004, 150）。這算不算是「隨風飄蕩」、「跟著空氣辦事」？北京市郊的農業生產，在 1959 年並沒有出現彭真所預期的高產佳績。他在同年 7 月強調糧食畝產增加了數十斤，但也承認先前「說了空話」（彭真 1959b, 72）。

時至 1960 年，彭真在北京市郊的糧食產量問題上，仍有估產太高、流於冒失的傾向，以致出現了糧食生產指標調降後，還是無法達到的窘況。針對 1960 年北京市的糧食產量問題，1960 年 4 月，彭真在市委書記處會議上提出：「糧食生產能否爭取達到 21 億斤，甚至更多，要認真研究。」（《彭真傳》編寫組 2012c, 17）亦即較諸 1959 年的 14 億斤，要多增產 50%，明顯失實並浮誇。6 月，北京市委將糧產指標調降至 16 億斤。彭真在審閱生產計劃時卻仍強調：「如果沒有特大的自然災害，這些指標是可能完成達到或可超額完成的。」（彭真 1960, 13）9 月，劉仁在市委擴大會議上坦言：「北京糧食指標原訂 16 億斤，肯定達不到。」（滿運來主編 2002, 108-109）

彭真在三年農業「大躍進」，尤其是農業估產和指標設定的問題上，相較於中央主管農業的譚震林的誇誇其談、嚴重脫離現實，乃是「小巫見大巫」。彭真私下也稱之為「譚大炮」（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1 年 7 月）。但綜前所述，彭真在北京市的有關問題上，也是有失冷靜和務實。彭真之所以如此，既受到外在的政治風向影響（催逼農業飛躍邁進），也因其本人內在對意識形態的篤信（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大助解放生產力）。

## 參、推促首都工業「大躍進」

### 一、工業規劃和生產動員

中共定都北京市後，將之定位為政治與文化中心；再加上，中共當時基於戰爭可能爆發的考量，將工業投資主要安排在京漢鐵路以西的地區，而北京市不在此投資布局以內。因此，在中共的第一個五年經濟計畫（1953~1957）期間的國家工業投資中，北京市雖有新建的工業項目，但總體上仍甚是薄弱。北京市比較有規模的石景山鋼鐵廠，也設備老舊、急需投資更新。

北京市要如何發展工業，乃是彭真主政首都工作後思索、牽掛的問題。他在中共建政初期即指示北京市委要有專人研究工業政策（王大明 2014, 27）。「大躍進」運動主張大幅建設、擴張工業，提供北京市發展工業的難得機會。彭真、劉仁和市委主管

工業的書記鄭天翔，對此皆躍躍欲試，希望藉機一舉改變首都工業發展落後、貧瘠的現象。根據「文革」揭發資料，彭真就曾表示：「石鋼的擴建，就誤了兩年，就是因為過去頭上有緊箍咒和蓋子，說什麼京漢線以西。其實北京正跨在京漢線路上嘛！第二個五年計畫（1958~1962）再不發展就沒有意思了。」（原北京市委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編 1967, 23）

1958 年 3 月，在成都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常稱成都會議）期間，彭真特地安排劉仁向毛澤東報告北京市欲趁勢發展工業的意見。毛澤東聽取彙報後予以肯定，同意北京市發展現代工業，實質解除了過去「京漢路以東不發展大工業」的規定（張其錕、儲傳亨 2014, 39）；毛並要求北京市委提交具體的規畫。

5 月初，由鄭天翔起草、劉仁把關，最後經過彭真審閱後（中共北京市委 1958a, 15-19），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呈送《市委關於北京市工業發展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其指出：北京市在 1957 年的工業總產值（包括中央國營）約 21 億元，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 3.2%，未及上海的 1/6，僅有天津的 1/2。北京市工業發展的口號是「爭取在十年內根本改變首都工業的落後面貌，趕上天津」（中共北京市委 2003, 346, 349）。然而，隨著「大躍進」的氣氛越加濃郁，中共中央對「超英趕美」的設定時程愈益縮短的情況下，彭真、劉仁也心急地加速起來。他們在 6 月下旬完成的《關於北京市工業建設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將口號改為「苦戰三年，大幹五年，把首都建成現代的工業基地」（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 2000, 367）。

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工業發展規劃中，著重強調發展冶金工業、機械電機製造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其中，擴建或新建石景山鋼鐵廠、北京鋼廠和北京特殊鋼廠被置於顯目的位置。石景山鋼鐵廠的擴廠增產計畫，就獲得一心執迷鋼鐵增產的毛澤東的好評。8 月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北戴河會議），因為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將 1958 年的指標定為 1,070 萬噸鋼，為 1957 年鋼產量 535 萬噸的一倍）、人民公社化運動而著稱。會議期間，毛就舉石景山鋼鐵廠每期倍增的產量計畫為例，說明「群眾積極性」在促進生產上的重要影響（李銳 1999, 111-112）。

為了激勵北京市工業「大躍進」的發展，前述的農業「大躍進」誓師大會後的第四天，8 月 21 日，彭真同樣以天壇為址，召開工業、交通運輸業「大躍進」誓師大會。彭真在會上首先介紹市郊農業「大躍進」的情形，特別是重提他「消滅一二三（千斤），爭取四五六（千斤）」的主張，示意北京市的工業不能落後於農業，也一定要有追求高額生產指標的壯志。彭真接下來呼應當時正在舉行的北戴河會議，強調大煉鋼鐵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央最近一而再地提高 1958 年的鋼鐵生產指標，乃因為「中國人很多，沒有鋼。美國幾千萬人，1 億噸鋼，你就沒有？你地大、物博、人口多，就 540 萬噸鋼？」正由於中國在鋼鐵生產上遠遜於美國，所以遭到美國的欺侮和壓迫，台灣更因此被美國所侵佔。中國唯有在工業取得大幅躍進的發展後，才能改變這種被壓制的局面。彭真最後要求每個單位都要經由辯論的方式，鼓振幹部和工人的幹勁，提出新的生產計畫並督促執行，終極的目標就是超越美國（彭真 1958a, 14-16, 18, 21-22）。



在彭真曉以大煉鋼鐵的國家利益和發展工業的現實利害後，北京市的工業系統代表莫不義憤填膺、摩拳擦掌。例如：北京鋼廠的出席代表發言表示：「我廠完全擁護彭真同志的報告」，「保證完成黨和國家交給我們年產 13 萬噸鋼的任務。1 斤也不會少，爭取 15 萬噸。」提出鋼鐵增長計畫、風光地引起毛澤東注意的石景山鋼鐵廠，其與會代表也說：「我們完全擁護和響應彭真同志的指示」，並立誓「用不斷革命精神，提出新躍進計畫，努力克服落後，力爭上游，爭取站到全國先進的前列。」（中共北京市委 1958b, 54, 64-65）經過彭真在天壇的號召和動員，北京市也隨即投入全國大煉鋼鐵運動，共同為生產 1,070 萬噸的目標奮鬥。

## 二、北京市大煉鋼鐵的情形

彭真在全國大煉鋼鐵運動中，以中央書記處領導人的身分，擔任運動監督執行者的角色，甚至有「總調度」之稱。彭真一方面經常召集國務院相關部會首長開會布置工作；另一方面召開全國電話會議，催促地方各省完成中央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他強調要「土洋並舉」，也就是正規的鋼鐵廠需要加足馬力增產以外，也要動員一般幹部和民衆以土法煉鋼的方式積極參與（Chung 2015, 132-134）。彭真在綜攬大煉鋼鐵運動的全局之時，他也緊密注意北京市的鋼鐵生產。

在 1958 年 8 月底開始的大煉鋼鐵運動中，北京市被分配 20 萬噸鋼的生產指標。北京市的鋼產任務配額，在全國鋼鐵生產的總目標中僅佔很小的比例，但對北京市的鋼鐵生產能力而言，是相當吃重的任務。因為時至 1958 年 7 月底，北京市僅累積生產 2.5 萬噸鋼，同生產任務還相距 17.5 萬噸。有鑑於煉鋼情勢的急迫，彭真在市委成立「大煉鋼鐵領導小組」，並指定劉仁擔任組長。

在煉鋼問題上，劉仁剛開始抱持的是重「洋」輕「土」的態度，也就是對土法煉鋼較無興趣，甚至曾通令對之的推行範圍加以限制。以劉仁為代表的北京市委「開始跟得不緊」的態度，遭到「中央批評」（孟志元 2013, 336）。在彭真的積極介入下，劉仁才一改他對土法煉鋼的消極態度。

首先、從彭真的角度而言，他在中央指揮、力推各地採行土法煉鋼，若其治下的北京市對此法表現得意興闌珊，他恐怕難以服眾。其次、由於斯時北京市正規鋼鐵廠的生產能力實在有限（石景山鋼鐵廠等正在修建中，尚未大量投入生產），根本無法單獨達致中央規定的指標，因此求諸土法煉鋼也是勢在必行。10 月初，彭真指使劉仁派人前去西南地區學習土法煉鋼的經驗（劉涌 2007）。在彭真表明對土法煉鋼的支持後，10 月 7 日，北京市委通令全市開展「小、土、群」煉鋼運動。

10 月 23 日，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召開的電話會議，聽取 12 個省市負責人報告、討論鋼鐵生產事宜。其中也包括北京市（《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49）。可能在電話會議中領獲彭真的指示或是受到其他省市表現的刺激，北京市在 26 日動員 70 萬人參加煉鋼的活動。因為該日為星期天，故有「鋼鐵星期天」之稱。全市在當月共建成 1.9 萬個小高爐，連北京市委機關所在地的後院空地，也「煉了起來」、動手「炒鋼」（孟

志元 2013, 336)。另外，爲了讓毛澤東近身感受土法煉鋼的熱潮和「人民群眾的發明創造」，彭真約此前後也派秘書找相關「行家」，協助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內建成一座土煉鋼爐，並運來焦炭和生鐵開始運轉煉鋼。毛澤東後來也曾前來視察（葉子龍 2000, 218-220）。

由於大煉鋼鐵「軍情」緊急，再加上市委首長彭真在中央坐鎮號令，不能讓之丟臉、跌股，在這段期間每天凌晨一點，劉仁聽取具體負責執行煉鋼任務的副市長、工業部部長賈庭三彙報生產進度；賈氏在報告結束後，即又安排次日的煉鋼計劃。在日復一日的高壓下，賈氏甚至因此心臟被逼出病來、健康亮起紅燈（孟志元 2013, 337）。

群眾性的大煉鋼鐵運動在短時之內雖能急速推進北京市的鋼鐵產量，但是在公眾煉鋼的過程中，爲了蒐集煉鋼所需的原料，許多房屋、殿宇、農具遭到破壞，生活的炊具也被砸爛。另外，由於缺少原料和參與民眾並無掌握煉鋼技術，運動產出的鋼，也有品質低下、合格率低的問題，甚至被譏笑爲「豆腐渣鋼」（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7, 239-240）。在北京市的將士用命之下，到了 1958 年底，全市全年生產鋼 15.9 萬噸，其中合格的僅約有 12 萬噸，與年產 20 萬噸的鋼產指標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2011, 216）。

北京市在 1959 年的鋼鐵生產能力，因爲有石景山鋼鐵廠擴建完成、迅速投產的助陣而大爲增強（彭真和市委其他領導人爲了確保石鋼工程按期完工和投產，派發電報給 13 個省市求援，爭取所需物資）（中共北京市委工業工委研究室 2002, 119）。但因爲中央分配給北京市的鋼產任務仍是不切實際的高指標（50 萬噸），北京市最後雖努力生產了 38 萬噸鋼，但仍是沒有達標。在「大躍進」的第三年，北京市仍舊雄心沖天，提出 1960 年鋼產量要達到 54 萬噸的指標（較 1959 年增長 42%），如此不顧一切，只爲遂行多鋼強國的壯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2011, 216-217, 241）。

### 三、相關工業政策的問題

北京市在 1958 年大煉鋼鐵和擴大工業投資的過程中，直接造成了兩個問題。這與彭真的領導脫不了干係。

#### （一）對農業生產和副食品供應造成擠壓效應

1959 年 7 月 6 日，彭真在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介紹北京市的情況時坦言：「去年在勞動力安排上也有缺點，基本建設、水利、深翻地和煉鋼等集中的勞動力過多了些，在秋收時有不少人去煉鋼了，結果秋收中有不少浪費，不少花生、白薯、棉花丟在地裡，沒有收好。」（彭真 1959a, 3）彭真不好意思向外賓明說的是，北京市因爲將精力、人力傾斜挹注在鋼鐵、工業生產上，輕忽、荒廢了副食品的生產，在 1958 年底至 1959 年春造成市民排隊搶購的情形，相關現象更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和批評（鍾延麟 2015, 138）。

從 1958 年以來，中共不斷對內、對外聲稱中國的經濟生產如何地大躍進：諷刺的是，首都民衆在採買蔬菜、副食品 and 日用百貨時，竟然大排長龍、購買困難（新華通訊社編 1958, 35-37）。毛澤東聞知後，在 1959 年 5 月 21 日指示鄧小平：由中央書記處召集北京市委，就市場供應問題加以討論。在中央書記處和北京市兼有要職的彭真，對此自是尷尬。他在次日即作自我批評：「去年有一時期，對群眾生活用品生產確有點疏忽。北京人口已近七百萬，副食品不足，是個大問題，連牙籤、筍帚、髮卡也供不上，群眾都有反映。」（《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403-406）為解決此一問題，北京市緊急調運外地的相關食品和物資，進行計劃分配、定量供應，以及安排專人負責組織生產（新華通訊社編 1959b, 12-16）。經此缺菜風波以後，北京市委就一直注意全市的蔬菜（特別是大白菜）供應，將之視為一件不能掉以輕心的「大事」（鄭天翔 1989, 16-17）。

## （二）因急於擴張工業、執意追求工業產值，造成不小的負面作用

北京市因為在工業建設上急於求成，在「大躍進」初期對於引進工業的類別性質、大小規模、配套措施（用水、用地、用電問題）、區位安排（市內或是城市邊沿、郊區），以及污染防治等問題，皆未經周密評估和審慎規劃，即大舉引進項目、設廠開工。

在「大躍進」方興未艾的 1959 年春，北京市委就針對當時出現供水緊張的問題指出：「過去在安排工業建設的同時，沒有充分估計到水的作用，因此，造成比例失調的現象，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新華通訊社編 1959d, 5-6）北京市負責城市規劃管理的官員，在 1999 年回顧這段歷史時也承認：「在這些問題上出了很多失誤，甚至是錯誤。污染這麼嚴重，缺水嚴重，能源消耗太大。」（周永源 2003, 181）在相關問題上，彭真也有一個認識緩慢變化、甚至有所反覆的過程。

彭真起初僅單方面側重強調工業產值在短期內要成倍增長。1958 年 3 月 11 日，彭真針對工廠設址問題指示：「今後城內工廠的設置，應積極安排。」（賈星五 1958, 1）同年 9 月 2 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會議上下令：「北京市工業總產值明年力爭翻一番。」（《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32-333）這無疑鼓勵市裏工業負責幹部只顧大幹快上、追求產值，不論項目良莠，也不問效果代價。1959 年 7 月，彭真也很自豪地跟蒙古大使介紹「大躍進」開始後，北京市工業產值大步跨進的情況：「北京解放時工業總產值是 1 億 7000 萬元，去年增加到 46 億元，今年前六個月已達到 30 億，工業是有發展的。」（彭真 1959a, 2）

俟彭真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業已是北京市開展「大辦工業」近一年以後的事。1959 年 3 月 8 日，彭真在北京市委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工業，北京以後要搞現代化的，不要『饑不擇食』，上一些技術落後與首都不相稱的工廠。」（《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82）他甚至以中共延安時期的紅軍老幹部為急尋配偶、不加選擇，而在之後懊悔不已為例，強調「現在要選擇了，不夠水準的工廠就不要搞了，否則將來要造成被

動。」(彭靜雲 2003, 292-293) 即便如此, 彭真在 7 月仍不無矛盾地向北京市的工業企業幹部示警:「鬆勁情緒和右傾保守思想是當前威脅我們更好地完成全年任務的主要危險」(《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421)。

再加上, 由於 1959 年夏的「反右傾」運動和其後另一波「大躍進」的再起, 北京市委在 1960 年的工業生產規劃上, 繼續偏重產值和數量。經彭真事先審定後, 劉仁宣告在 1959 年產值 70 億元的基礎上, 訂定 1960 年完成 95 億元的目標, 甚至提出「四本賬」「翻一番」(亦即 140 億元) 的構想, 並請工業部門幹部「考慮能否做到」(劉仁 2004, 438)。北京市走出這種工業發展偏向, 要直到運動結束的經濟調整時期。

## 肆、監造「十大工程」和其他建設

中共在 1958 年自認找到「大躍進」這一條最適合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1959 年又逢中共建政十周年, 可說是喜上加喜。中共中央計劃擴大慶祝十周年國慶, 並在其中展現「大躍進」的精神和成就。中共領導人構想出來的一項重要國慶獻禮方案, 就是以「大躍進」主張的高速方式, 利用一年左右的時間, 在首都北京市建成「十大工程」(也常稱為「十大建築」)。在幾經調整後, 「十大工程」最後定為: 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民族文化宮、北京民族飯店(因位居西長安街, 最初的名稱是長安飯店)、釣魚台國賓館、華僑大廈。另外, 為盛大慶祝十周年國慶, 中共同時也計劃擴建天安門廣場。由於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規劃沿著天安門廣場興建, 因此天安門廣場的擴建乃與相關工程同步進行、相互配合。

因為國慶建設工程落腳北京市, 就由彭真領導的北京市承建, 並成為該市「大躍進」的一個重點內容(人民大會堂就被市委看作是「天字號」工程)(《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971)。彭真被中共中央任命為首都建設籌備委員會主任, 負責統籌相關事宜(《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32)。

彭真在北京市委成立「十大工程領導小組」, 由其下的市委主要領導幹部組成。具體的分工情況是: 劉仁負責「抓總」(亦即統管全面、也與聞設計和施工); 原任國務院中央城市建設部部長、1958 年春調任為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的萬里, 出面領導市政府負責建築本體; 鄭天翔則負責後勤、物資供應和交通運送(馬句 2014, 45-46)。關於此事, 彭真也相當器重趙鵬飛。趙鵬飛自中共建政後即參與北京市的城市建設工作, 彭真對其工作表現甚為欣賞, 在 1954 年將之調任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為了集中力量建設「十大工程」, 彭真在 1958 年新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 以統一指揮市內的有關部門, 並且親自點將趙氏出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趙鵬飛 2006, 185-186)。彭真對趙鵬飛較為熟悉和信任, 在「十大工程」設計和施工的過程中, 他經常透過趙氏了解情況、表達意見。彭真後來曾譽之為「十大建築的台柱子」。

關於築造國慶「十大工程」的政治目的和意義, 彭真在 1958 年 9 月 2 日的市委常

委會議上，強調其「要把我國大躍進的面貌表現出來，要立即進行準備」。同年秋，彭真也對趙鵬飛等人表示：

黨中央決定在北京興建十大工程，這件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市委、市人委要堅決貫徹，抓緊籌畫，廣泛約請全國著名專家精心設計，切實保證工程質量，在國慶十周年前如期完工。十大紀念性工程的完成，將在人民中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幹勁，鼓舞和動員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33, 344）。

對於「十大工程」的設計問題，彭真謹慎地準備和處理，注意聽取和傳達中共中央和黨內上級的意見。有關反映國慶工程規劃的縮小模型和參考影片，彭真在親予過目、把關後，率領負責官員前赴中共中央書記處彙報；他進而將之呈報給中央政治局做最後的審定（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8, 90）。彭真在指導下屬設計國慶工程的具體方案時，首重傳達毛澤東的看法和期許（《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45）。他也甚為強調周恩來作為「十大工程的總設計師」的領導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以批判 1956 年「反冒進」的方式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反冒進」的主持者周恩來飽受政治壓力，甚至主動提出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在此過程中，彭真曾偕同毛當面對周恩來加以指正；他也命令北京市委清查《北京日報》過去有否刊登「反冒進」的文章，以示政治自清（《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10）。在毛澤東的安排下，「大躍進」開始後，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工作就必須聽命於鄧小平、彭真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指揮。事實上，彭真和周恩來在一起督導全國大煉鋼鐵運動時，前者承上啓下的指揮地位就高於後者。在籌建「十大工程」上，彭真突出周恩來的「總設計師」地位，除了想藉此表達對周氏的尊重之意，並基於對之具有相關領導才幹的了解（鍾延麟 2014, 274），或也是他在實質分佔周氏的政府職權後的一種「抓大放小」，甚至是出於一種補償心理。

彭真除了注意轉達上級領導的意見，也會表達其個人對設計「十大工程」的主張。彭真視察山西時，曾因為掛心國慶工程的設計問題，臨時將北京市的負責設計人員召來太原，當面聽取彙報並給予指示（申予榮 2002, 246）。彭真亦曾交代秘書代之聽取關於民族飯店的門窗設計的彙報（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8, 111-112）。

彭真為了讓國慶工程按時完工，以不辜負中央對他個人和北京市的期待，他在施工的過程中，密切緊盯建造進度，進行指揮、協調，也設定竣工期限。1958 年 12 月 16 日，彭真召集劉仁、萬里、趙鵬飛等人談論國慶工程事宜。他指示：「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美術展覽館五項，預計 1959 年 2 月中完成整體結構，爭取 6 月前完成，然後集中力量突擊人大會堂。要爭取提前完成，必要時抽調工業建築力量。」1959 年 2 月 24 日，彭真在市委書記處會議上指出：國慶工程以天安門前的大會堂、博物館、北京火車站和長安飯店最為緊張。他指示：工程現

已進入「衝鋒陷陣」階段，要與有關部門商訂進度計畫，所需材料開列清單向國家計委提出。請上海、天津、瀋陽來人訂好合同，並派人前去工廠監督，力爭 8 月 20 日竣工（《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62, 378-389）。

彭真有時也會親臨工地現場視察並發號施令。對於人民大會堂的大門中間柱距的問題，彭真偏好中間廊柱較寬的中國風格，反對採取西方的廊柱等距設計。1959 年 1 月，彭真赴人民大會堂工地查勘時不甚滿意，他不管廊柱已基本被安置定位，當場指示趙鵬飛設法進一步地加大中間廊柱的距離。趙氏只好領導技術人員想出修改對策，以達到彭真的要求（趙鵬飛 2006, 208-209）。

由於「十大工程」的質量問題攸關國家的門面，彭真對此甚為關心。1959 年 1 月 12 日，彭真在慶祝建國十周年籌備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指示：「各項建築都要強調質量第一，保證百分之百的安全。」（《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371）在建造的過程中，彭真也特地交代：

工程質量一定要保證，十大建築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都的最重要建築，是顯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民族精神的建築。百年大計，質量第一，一定要精心施工，切實保證工程質量。故宮已建設了 500 多年，到現在還沒有大的損壞。人民大會堂建好之後，其堅固程度要不亞於故宮，要經受得起時間的考驗（馬句 2003, 201）。

在趕建人民大會堂的過程中，建材的質量問題一度影響、耽擱工程的進度。鞍山鋼鐵公司負責冶煉、軋製的鋼材，因為不符質量標準而不堪使用（新華通訊社編 1959c, 3）。萬里和中央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等人研究後，要求鞍鋼重新組織生產。原訂的組裝大會堂屋架的計畫，不得不因此而展期、後延。萬里為此寫信向彭真報告兼抱怨（萬里 1959b, 1-3）。這如實反映了「大躍進」的大煉鋼鐵運動重量甚於重質的弊病。彭真之後到鞍鋼視察期間，就特別囑咐後者要確實履行提供國慶工程所需的鋼鐵任務。他表示：「北京天安門工程所需的鋼材，給了你們很大的壓力。希望你們以總路線精神來完成為建國十周年的紀念工程所承擔的光榮任務。」（《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409）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完工以後，為了檢驗、確定其內部樓層的負荷承載力，還特別請北京軍區調派一個師的人員在二、三樓試坐，甚至以上下跳躍的方式測試（馬句 2003, 201-202）。

彭真參與監製的「十大工程」，最後準時地一一落成。它的順利完工對值在進行的「大躍進」具有重大的宣傳意義，因為其直接被中共當作運動的具體成就並反映其巨大的政治威力。根據《北京日報》1959 年 10 月 9 日的報導：彭真在 10 月 8 日慶祝「十大工程」完工的宴會上表示：「首都各大建築工程的勝利完成，首先應歸功於黨的英明領導。它是大躍進的成果，是黨的總路線的偉大勝利。」「十大工程」雖非彭真領導的北京市所獨力完成，但因為其座落在北京市，自然被歸類為首都的運動重要政績。彭真就表示：「我們首都的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對彭真個人而言，「十大工

程」也為之起到政治宣傳和加分的作用。萬里在總結「十大工程」的成績時，當提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導」，將彭真和周恩來並置，強調：「周總理、彭真市長曾數次到國慶工程工地視察，親自審查設計等」（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1998, 127）。

彭真在北京市繳出國慶工程這紙亮麗的成績單背後，其實也付出一些代價。例如：由於急於修建相關工程，原有民房拆除後的住民安遷問題未盡妥善，引發民怨。萬里為此在 1959 年 1 月向周恩來寫檢討報告。萬里在信中坦承，主管單位「訪問了 1,297 戶搬家市民，其中，有意見的就有 491 戶」（萬里 1959a, 1-3）。亦即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拆遷戶懷有怨言。9 月中旬舉行的北京市三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彭真對此表示歉意：「為了修建國慶十周年的一批工程，拆民房比較急，一部分人沒有安置好，或搬遷後使職工上班、學生上學不方便，我們向他們賠個不是，道個歉，請代表們轉達。」（《彭真傳》編寫組 2012b, 436）

由於彭真監造首都國慶工程的績效卓著，中共中央在 1959 年底又責成彭真領銜的北京市辦理一項緊急的工程任務——以 7 個月的時間，將中共高幹經常前往開會、休憩的北戴河大肆翻修，具體內容包括：修建會議禮堂、建設 30 間高級別墅，以及配套的道路工程和水電、暖器設備設施等（趙鵬飛 2006, 270-271）。著眼於「大躍進」步入第三年後，總體經濟已出現凋敝之勢，這個北戴河工程可說是豪華、甚至近乎奢侈。但北京市仍然以高效的執行力完成任務，圓滿地向中央交差。

1960 年，彭真在北京市公共建設的重大「手筆」，乃與他正在該市積極領導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相關。彭真認為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後，既要組織居民生產，又要安排居民生活，因而有大量的用房需求，包括：供生產用的廠房，解放婦女勞動力的托兒所和食堂。彭真在 1960 年 4 月初指示：「要突擊蓋一批生活用房，包括幾層樓的宿舍。」他更具體提出同年要在城內的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區，以及東側的朝陽區大興房舍，以建成一百萬平方米為目標。彭真的此一政策倡議頗為有心：

城市公社用房很困難，除了生產用房，還要辦托兒所、食堂。進城後我們蓋工廠、職工宿舍不少，但街道民房拆得多、蓋得少，老百姓不滿意。建中小學和民房少，這是群眾觀點最不夠的地方，要作為中心工作之一來抓（《彭真傳》編寫組 2012c, 14）。

但是彭真的建設方案企圖過大、過急，結果也未如人意。因為相關工程龐大，其所需的投資和原料，市委和政府只能提供一半，彭真要各區委自行籌集、生產另一半，他更建議後者盡量採取土法煉鋼的方式，自力更生地生產生鐵、鋼材、水泥，並爭取取出計畫、多修多建（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整理 1960, 1-2）。

在倉促上馬、限時完成，以及資金、原料又有重大缺口的情況下，這批市民用房存在設計簡陋、質量低下的問題，相較此前一年落成的氣勢恢弘、金碧輝煌的「十大建築」，實有如天壤之別。彭真在多年後行經朝陽區，見到「大躍進」時期所蓋的房舍

時（當時更顯斑駁不堪，準備拆除、重建），也不禁感慨：「那時是我們這些人頭腦發熱。」（李海文、王燕玲編著 2002, 88）

## 伍、結 論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之盡展生產潛能，一同投入國家的建設。事實上，毛也以各地在運動中的積極表現程度，作為對之評比的關鍵標準。各省市擔心被中共中央視為敷衍了事、辦事不力，又加上彼此之間的政治攀比，故皆爭先恐後、竭盡所能。在此政治背景下，身兼北京市領導人的彭真，對於該地運動的發展，自是緊抓不放、不敢輕忽。彭真同時也承擔北京市一舉一動備受中央矚目、不能浪得首都虛名的壓力。

在中共中央主張的農業和工業「大躍進」上，彭真領導北京市悉心配合。他在 1958 年親自開會鼓吹農業高產指標，動員投入大煉鋼鐵行列，並藉機發展當地的相關部門與產業。北京市的工業「就是在這個時候搞起來的」（周永源 2003, 183）。在市政建設上，彭真欣然接受中央交付的短期內在首都建造國慶工程的任務，全力為「大躍進」提供一個立竿見影的例證。

彭真領導下北京市的運動發展，乃與「大躍進」的總體走向和跌宕起伏緊密相連。1958 年底至 1959 年中，毛澤東主導下的運動「糾偏」（雖較此前有所降溫，但仍屬一定的「高燒」狀態），因為 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鬥爭而驟然中斷，甚而逆轉、掀起來勢更猛的第二回「大躍進」（主要表現在 1959 年底至 1960 年）。在「反右傾」、「繼續躍進」的號角聲響下，綜合正文各節所述，彭真麾下的北京市無論在 1960 年糧產指標、鋼鐵指標和工業產值設定上，都相應提出華而不實的目標，未幾即面臨跳票或付出慘痛代價才勉強兌現。1960 年初，中共中央推行城市人民公社政策，以為「大躍進」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彭真在北京市自然不落人後，甚至志當先鋒和楷模。為追逐城市人民公社的海市蜃樓，他在市政建設方面也豪氣干雲地推出大型建房方案，只是為求速成，品質堪慮。

無可諱言，彭真在領導北京市的三年運動過程中，有時也走火、迷失，甚而陷入狂熱。「大躍進」難以為繼、甫告結束的 1961 年 7 月，彭真就招認其在 1958 年底的《前線》發刊詞中倡言要走「群眾路線」和認真「調查研究」，他自己是「看到了，說出來，沒有做到，就等於沒有看到，沒有說」（《彭真傳》編寫組 2012c, 138）。至於「大躍進」期間，彭真在北京市其他領域如文教、衛生、政法、水利推行的運動相關政策，待未來更多資料面世後，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彭真用心地將「大躍進」運動落實於北京市的過程中，高估產、高指標、強壓力的政策弊端（如引發經濟失調、擠壓農業、物資短缺、短視近利、犧牲質量），以及公社制度的內在弊病（如導致「一平二調」、生產消極），都在京畿地區出現。「大躍進」運動最引人詬病的嚴重後果是其造成大規模的饑饉和死亡。事實上，北京市也被



籠罩在缺糧餓肚的陰影之下。北京市當地的農業生產沒有出現彭真許願的「大躍進」奇蹟，不但無法實行自給，反而更加仰賴外地糧食的調運和供應。讓糧食情勢益形惡化的重要原因是，彭真在北京市大力發展工業、大興土木，引進衆多勞力，進一步地增加該市糧食消費的需求和總量。在此情況下，北京市幾度瀕臨斷糧的危險，民衆浮腫現象頻傳，甚至也出現餓死事件。

總體來看，相對於其他地方，北京市的糧荒災情畢竟還屬輕微。這主要是因為北京市作為首都，其動見觀瞻影響甚鉅。中共中央寧以挖東牆補西牆的方法，力保北京市的糧食基本供應。對此一政策，彭真果斷厲行。1959 年底，彭真在一次全國電話會議上向各地領導人強調：「省裏死了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他更直接指令已出現饑荒的貴州省緊急調糧 1 億斤給北京市應急（王民三 2010, 48）。在 1960 年，彭真多次電話催促中央西南局領導人李井泉，將四川省（本身即是缺糧「重災區」）的糧食送交給北京市（《彭真傳》編寫組 2012a, 1007）。在彭真的努力下，北京市缺糧的燃眉之急，每每化險為夷，使之得以繼續對外上演中國國內平安無事的戲碼，從而保住了中共黨國的顏面。但是其直接後果就是造成負責緊急調糧任務的相關省份的人命損失。對此，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劉仁、鄭天翔心知肚明，事後仍唏噓不已、甚感不安（張宏量口述、王朝雨整理 2002, 108；鄭天翔 2002, 5）。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大躍進」浪潮過後至「文革」爆發以前，彭真在北京市的施政和產業規劃，較趨理性、實際。農業方面，彭真雖仍堅持市郊在公社制度下賡續培育農業高產田，但是已不再盲目追求「天文數字」，改而尋求可靠穩定、可望可及、漸次推廣的生產目標。工業方面，鑑於「大躍進」時期「盲目發展的錯誤」，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逐步形成「高（級）、精（密）、尖（端）、吃穿用（照顧民衆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供應），質量第一」的工業發展方向（馬甸 2003, 190-191；彭靜雲 2003, 293-294）。

彭真晚年極為重視出版其過往領導各項工作的言論和指示，既是保留歷史紀錄，更希冀確立自身的歷史地位。有關北京市的工作，就專門編有一冊（《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彭真同志關於北京工作的言論選編》）。其中關於三年「大躍進」的部分，彭真最後選定收錄者，主要是他的《前線》發刊詞和內容相近的演講摘要、他對「十大工程」所作的口頭指導（〈關於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和慶祝工程落成的講話。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設〉一文的由來，還是彭真主動倡議整理。他認為「十大工程」的重要性，絕不亞於 1990 年北京市亞洲運動會的相關工程。彭真指示秘書訪問當年參與「十大工程」的相關人員，蒐集彙整後，再經其本人修改審定而成。彭真甚至曾考慮將此文收錄在更具政治分量的《彭真文選》之內，然而，因其為事後的追述而非原始的講稿，最後只好作罷（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北京，2015 年 8 月）。

彭真如此積極著力此事，主要可能因為「十大工程」乃是他領導的北京市「大躍進」，成績最顯眼、享譽最大、也較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運動「果實」（彭真在「大躍進」後期和其後，就會特意安排外賓參觀相關建物，以令之信服中共政策的卓越和見

效) (鍾延麟 2016, 86)；而其個人對「十大工程」的指導作用，也應要留諸青史。此外，彭真認為當年也參與領導「十大工程」建設的萬里（「文革」前位在彭真以下的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之中，就屬之在「改革開放」時期政治仕途發展最好、也最為出名），在相關歷史評價上有自我抬高之嫌（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北京，2016年7月）。彭真是否有不欲任之專美於前、獨佔風采的考量，就不得而知了。

最後，本文對彭真領導北京市「大躍進」運動過程和影響的細節探討，也提供一個重要的側面和案例，可增進了解中共若干重要的歷史議題，在此簡要討論。例如：在毛澤東時期政治高度集權下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呈現的是強中央和弱地方的互動型態；中央號令一出，地方幾乎無所不從，突顯中央政策貫徹力的強度和強制。彭真兼具中央和地方的兩棲政治身分，以及他領導北京市時所具有的強烈的首都意識，更使之在各省市落實中央政令工作的平行比較中，志在前線、自居標兵。其次，關於中共計劃體制之下中央經濟、社會規劃地方化的問題，從彭真領導北京市「大躍進」的實例中，可以注意地方在膺從中央權威、套接當地環境的過程中，也並非是簡單的被動回應和機械響應而已，地方可藉機發展本來薄弱的產業和部門。不過這種屬於政治性的政策傾斜和為時不長的資源配置，未必符合本地的比較優勢和自然條件，其續航力和成本收益，長遠觀之未必有利。地方領導人若急功好利、獻媚中央，未作穩妥思慮即倉皇布置，更可能徒留低劣的政績或工程。

另外，鑑於中共早期政治中顯而易見的中央威勢和頗有限度的地方自主，所謂「地方主義」或是「獨立王國」的指涉和指控，經常所見的是：中央針對地方在政治上跟而不緊、自以為是或自行其是的現象，所慣用的定性手法和打壓手段。

\*

\*

\*

(收件：105年9月11日，接受：106年1月17日)

# Peng Zhen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rban Construction (1958~1960)

*Yen-Lin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upted, Peng Zhe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entral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 top offici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national capit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Peng Zhen's roles, policies and consequenc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GLF)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like other local Party bureaucrats, Peng encouraged and set up the unrealistic grain production quotas and mobilized the local cadres to implement the steel-making campaign in Beijing City.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onsidered the GLF to be a rare opportunity to facilitat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beit succeeding in completing the "Ten Grand Buildings" at all costs to demonstrat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spirit of the GLF, he carried out some controversial local building projects during the campaign. Consequently, Peng could not shirk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dverse effects brought by the devastating campaign in Beijing.

**Keywords:** Peng Zhen, Beijing Municipality, Great Leap Forward, Ten Grand Buildings

### 參考文獻

- 中共北京市委，1958a，〈市委有關北京市工業發展規劃向主席、中央的報告（1958 年 5 月 3~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255-05-001。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1958a. *Shiwei youguan beijingshi gongye fazhan guihua xiang zhuxi, zhongyang de baogao (1958 nian 5 yue 3~7 ri)*.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s Report Submitted to Chairman and Party Center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in Beijing Municipality on 3~7 May 1958.] Document no. 00255-05-001.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中共北京市委，1958b，〈各個黨委書記發言稿（1958 年 8 月 2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15-00167。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1958b. *Gege dangwei shuji fayangao (1958 nian 8 yue 23 ri)*. [Speeches by the Party Secretaries on August 23, 1958.] Document no. 001-015-00167.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中共北京市委，2003，〈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北京市工業發展問題向中央的報告（1958 年 5 月 3 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8 年）》：346-350，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2003.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guanyu beijingshi gongye fazhan wenti xiang zhongyang de baoga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s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Party Center on the Issu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 Municipality on May 3, 1958]. In “Beijingsh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1958 nian)”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8], eds. Beijingshi dangangu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2000，《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Liu Ren zhuan bianxiezuz. 2000. *Liu Ren zhuan*. [Biography of Liu Ren].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中共北京市委工業工委研究室，2002，〈彭真與北京工業〉，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在北京》：112-12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gongye gongwei yanjiushi. 2002. “Peng Zhen yu beijing gongye” [Peng Zhen and Beijing's Industry]. In “Peng Zhen zai beijing” [Peng Zhen in Beijing],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整理，1960，〈關於修建居民住宅的幾點意見（1960 年 4 月 1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131-001-00105。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bangongting (recorded). 1960. *Guanyu xiujian jumin zhuzhai de jidian yijian (1960 nian 4 yue 15 ri)* [Various Opinion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on April 15, 1960.] Document no. 131-001-00105.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2011，《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第 2 卷》，北京：北京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2011. *Zhongguo gongchandang*

- beijing lishi*, Vol. 2.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Beijing, Vol. 2].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1997，《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3輯》，北京：人民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 1997. *Shehui zhuyi shiqi zhonggong beijing dangshi jishi*, Vol. 3. [History of Beijing CCP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Vol. 3].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1998，《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4輯》，北京：人民出版社。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ed. 1998. *Shehui zhuyi shiqi zhonggong beijing dangshi jishi*, Vol. 4. [History of Beijing CCP in the Socialist Period, Vol. 4].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王大明，2014，〈紀念我終生難忘的老領導鄭天翔同志〉，《鄭天翔紀念文集》編寫組編，《鄭天翔紀念文集》：27-33，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Wang, Da-ming. 2014. “Jinian wo zhongsheng nanwang de laolingdao Zheng Tian-xiang tongzhi” [Commemorate My Unforgettable Old Superior Comrade Zheng Tianxiang]. In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Zheng Tianxiang], ed.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bianxiezu. Beijing: Renmin fayuan chubanshe.
- 王民三，2010，〈1959~1960年貴州糧政日記〉，《炎黃春秋》，8：44-52。Wang, Min-san. 2010. “1959~1960 nian guizhou liangzheng riji” [A Diary Regarding Guizhou's Grain Affairs in 1959~1960].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8: 44-52.
- 申予榮，2002，〈彭真與北京城市建設規劃的制定〉，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在北京》：232-2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Shen, Yu-rong. 2002. “Peng Zhen yu beijing chengshi jianshe guihua de zhiding” [Peng Zhe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Beij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 “Peng Zhen zai beijing” [Peng Zhen in Beijing],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2002，《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Li, Hai-wen, and Yan-ling Wang eds. 2002. *Shiji duihua: yi xinzhongguo fazhi dianjiren Peng Zhen*. [A Century's Dialogue: In Remembrance of Peng Zhen, the Founder of Law in New China].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 李銳，1999，《「大躍進」親歷記，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Li, Rui. 1999. “Dayuejin” qinliji, Vol. 2.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Vol. 2]. Haikou: Nanfang chubanshe.
- 周永源，2003，〈新中國成立初北京城牆存廢之爭〉，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174-18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Zhou, Yong-yuan. 2003. “Xinzhongguo chengli chu beijing chengqiang cunfei zhi zheng” [The Dispute about Whether the Beijing City Walls Should be Dismantl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China]. In “Peng Zhen shizhang” [Mayor Peng Zhen], ed. Hai-wen Li.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 孟志元，2013，〈志元記述〉，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並不遙遠的記憶》：327-38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Meng, Zhi-yuan. 2013. “Zhi-yuan jishu” [Zhiyuan’s Personal Account]. In “Bingbu yaoyuan de jiyi” [*Memory not Faraway*],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邱會作，2011，《邱會作回憶錄，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Qiu, Hui-zuo. 2011. *Qiu Hui-zuo huiyilu, Vol. 1*. [*Memoir of Qiu Huizuo, Vol. 1*]. Hong Kong: Xinshiji chubanshe.
- 首鋼總公司黨委組織部黨史辦公室，2002，〈彭真關心首鋼二三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在北京》：124-1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Shougang zonggongsi dangwei zuzhibu dangshi bangongshi. 2002. “Peng Zhen guanxin shougang ersanshi” [Some Records Regarding Peng Zhen’s Concerns for Shougang Corporation]. In “Peng Zhen zai Beijing” [*Peng Zhen in Beijing*],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原北京市委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編，1967，《舊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罪惡活動大事記（1949~1966）》，北京：無出版者。Yuan Beijing shiwei Mao Zedong sixiang hongqi bingtuan ed. 1967. *Jiu Beijing shiwei Peng Zhen fangeming xiuzheng zhuyi jituan zuie huodong dashiji (1949~1966)*. [*Chronicle of Hideous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Group of Peng Zhen’s Old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Beijing.
- 馬句，2003，〈彭真和北京城市建設〉，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184-202，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Ma, Ju. 2003. “Peng Zhen he Beijing chengshi jianshe” [Peng Zhen and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In “Peng Zhen shizhang” [*Mayor Peng Zhen*], ed. Hai-wen Li.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 馬句，2014，〈懷念敬愛的老領導鄭天翔同志〉，《鄭天翔紀念文集》編寫組編，《鄭天翔紀念文集》：45-49，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Ma, Ju. 2014. “Huainian jingai de laolingdao Zheng Tian-xiang tongzhi” [Commemorate Beloved Old Superior Comrade Zheng Tianxiang]. In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Zheng Tianxiang*], ed.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bianxiez. Beijing: Renmin fayuan chubanshe.
- 張宏量口述、王朝雨整理，2002，〈跟隨劉仁同志到農村蹲點〉，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101-108，北京：群眾出版社。Zhang, Hong-Liang (recounted), and Chao-yu Wang (recorded). 2002. “Gensui Liu Ren tongzhi dao nongcun dundian” [Followed Comrade Liu Ren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In “Yongyuan nanwang Liu Ren tongzhi” [*Unforgettable Comrade Liu Ren*], ed. Guang-ren Liu.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 張其錕、儲傳亨，2014，〈風範永存〉，《鄭天翔紀念文集》編寫組編，《鄭天翔紀念文集》：34-44，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Zhang, Qi-kun, and Chuan-heng Chu. 2014.

“Fengfan yongcun” [An Everlasting Model]. In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Commemorative Collection of Zheng Tianxiang], ed. Zheng Tian-xiang jinian wenji bianxiezu. Beijing: Renmin fayuan chubanshe.

張道一，2013，〈我在北京親歷的一些歷史事件與反思〉，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風雨征程》：150-17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ang, Dao-yi. 2013. “Wo zai beijing qinli de yixie lishi shijian yu fansi” [My Own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on Some Historical Events in Beijing]. In “Fengyu zhengcheng” [The Journey of Expeditions],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彭真，1958a，〈彭真同志在北京市工業躍進大會（天壇大會）上的講話及賈庭三同志的報告（1958年8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15-00167。Peng, Zhen. 1958a. *Peng Zhen tongzhi zai beijingshi gongye yuejin dahui (tiantan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ji Jia Ting-san tongzhi de baogao (1958 nian 8 yue 23 ri)*. [Comrade Peng Zhen'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aimed at Making the Leap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and Comrade Jia Tingsan's Report on August 23, 1958.] Document no. 001-015-00167.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彭真，1958b，〈彭真市長接見羅馬尼亞駐華大使魯登科談話記錄（1958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室藏，檔號 109-00866-01（1）。Peng, Zhen. 1958b. *Peng Zhen shizhang jiejian luomaniya zhuhua dashi ludengke tanhua jilu (1958 nian 12 yue 19 ri)*.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Beijing Mayor Peng Zhen and the Roma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on December 19, 1958.] Document no. 109-00866-01（1）。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9a，〈彭真同志接見蒙古駐華大使沙拉布談話記錄（1959年7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室藏，檔號 106-00133-04（1）。Peng, Zhen. 1959a. *Peng Zhen tongzhi jiejian menggu zhuhua dashi shalabu tanhua jilu (1959 nian 7 yue 6 ri)*. [Records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omrade Peng Zhen and the Mongolia's Ambassador to China on July 6, 1959.] Document no. 106-00133-04（1）。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真，1959b，〈在7月13日全市工業系統黨員幹部會議上彭真、賈庭三同志的講話提綱和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15-00209。Peng, Zhen. 1959b. *Zai 7 yue 13 ri quanshi gongye xitong dangyuan ganbu huiyi shang Peng Zhen, Jia Ting-san tongzhi de jianghua tigang he jilu*. [Speeches by Comrade Peng Zhen and Jia Tingsan at a Conferenc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the Municipal Industry Sector on July 13, 1959.] Document no. 001-015-00209.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彭真，1960，〈彭真同志修改過的關於北京市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1959年財政收支決算、1960年財政收支預算草案的報告（1960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06-01658。Peng, Zhen. 1960. *Peng Zhen tongzhi xiugai*

- guo de guanyu beijingshi 1960 nian guomin jingji jihua he 1959 nian caizheng shouzhi juesuan, 1960 nian caizheng shouzhi yusuan caoan de baogao (1960 nian 6 yue 10 ri)*. [Report Regarding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s 1959 National Economic Plan, 1959 Financial Plan, and 1960 Financial Plan Draft Revised by Comrade Peng Zhen on June 10, 1960.] Document no. 001-006-01658.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彭真，1992，〈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1958年11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編，〈站在革命和建設的最前線：彭真同志關於北京工作的言論選編〉：251-257，北京：北京出版社。Peng, Zhen. 1992. “Zhanzai geming he jianshe de zui qianxian (1958 nian 11 yue 25 ri)” [Stand in the Very Front Line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November 25, 1958]. In “Zhanzai geming he jianshe de zui qianxian: Peng Zhen tongzhi guanyu beijing gongzuo de yanlun xuanbian” [Stand in the Very Front Line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 Collection of Peng Zhen's Speeches Regarding Beijing's Works], e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彭真，2003，〈在農業躍進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58年8月17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8年）〉：701-714，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Peng, Zhen. 2003. “Zai nongye yuejin shishi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1958 nian 8 yue 17 ri)” [The Speech at the Oath-taking Rally aimed at Making the Leap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 August 17, 1958]. In “Beijingsh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1958 nian)”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8], eds. Beijingshi dangangu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彭真，2004，〈在郊區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3月16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年）〉：136-157，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Peng, Zhen. 2004. “Zai jiaoqu wuji ganbu huiyishang de jianghua (1959 nian 3 yue 16 ri)” [Peng Zhen's Speech at a Conference of Five Ranks of Party Cadres in the Suburbs on March 16, 1959]. In “Beijingsh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1959 nian)”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59], eds. Beijingshi dangangu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2012a，〈彭真傳，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 2012a. *Peng Zhen zhuan, Vol. 3*. [Biography of Peng Zhen, Vol.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2012b，〈彭真年譜，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 2012b. *Peng Zhen nianpu, Vol. 3*.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彭真傳》編寫組，2012c，〈彭真年譜，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 2012c. *Peng Zhen nianpu, Vol. 4*.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4].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彭靜雲，2003，〈彭真：北京現代工業的奠基人〉，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286-297，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Peng, Jing-yun. 2003. “Peng Zhen: beijing xiandai gongye de dianjiren” [Peng Zhen: The Founder of Modern Industry in Beijing]. In “Peng Zhen shizhang” [Mayor Peng Zhen], ed. Hai-wen Li.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新華通訊社編，1958，〈北京市糧食、副食品供應緊張，飯館、旅店擁擠（1958年11月22日）〉，《內部參考》，2640：35-38。Xinhua tongxunshe ed. 1958. “Beijingshi liangshi, fushipin gongying jinzhang, fanguan, ludian yongji (1958 nian 11 yue 22 ri)” [Shortage of Grains and Non-Staple Foods Supply and Crowded Restaurants and Hotels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on November 22, 1958]. In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Beijing.

新華通訊社編，1959a，〈對在北京種試驗田缺乏信心，十個省的勞模返回本省（1959年1月22日）〉，《內部參考》，2691：8-20。Xinhua tongxunshe ed. 1959a. “Dui zai beijing zhong shiyantian quefa xinxin, shi ge sheng de laomo fanhui bensheng (1959 nian 1 yue 22 ri)” [Because Lacking of the Confidence in Cultivating Experimental Farming Plots in Beijing, Model Peasants from Ten Provinces Went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on January 22, 1959]. In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Beijing.

新華通訊社編，1959b，〈政治掛帥、計劃分配、安排生產：北京市委三管齊下扭轉市場供應緊張局面（1959年1月30日）〉，《內部參考》，2698：12-16。Xinhua tongxunshe ed. 1959b. “Zhengzhi guashuai, jihua fenpei, anpai shengchan: beijing shiwei sangan qixia niuzhuan shichang gongying jinzhang jumian (1959 nian 1 yue 30 ri)” [Politics in Command, Planned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Arrangements: Beijing Party Committee Adopted Three Strategies to Reverse the Shortage of Market Supply on January 30, 1959]. In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Beijing.

新華通訊社編，1959c，〈當前全國鋼鐵生產為什麼沒有完成計劃？（1959年2月21日）〉，《內部參考》，2713：3-5。Xinhua tongxunshe ed. 1959c. “Dangqian quanguo gangtie shengchan weisheme meiyou wancheng jihua? (1959 nian 2 yue 21 ri)” [Why Is the Current National Steel Production Plan Not Achieved? on February 21, 1959]. In “Neibu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Beijing.

新華通訊社編，1959d，〈與工業建設的同時，相應興建水源工程，北京、遼寧二地積極扭轉供水緊張的局面（1959年3月5日）〉，《內部參考》，2721：5-7。Xinhua tongxunshe ed. 1959d. “Yu gongye jianshe de tongshi, xiangying xingjian shuiyuan gongcheng, Beijing, liaoning erdi jiji niuzhuan gongshui jinzhang de jumian (1959 nian 3 yue 5 ri)” [While Developing Industry,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the Wat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ijing City and Liaoning Province Actively Take Actions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the Shortage of Water Supply on March 5, 1959]. In “Neibu

- cankao” [Internal Reference], Beijing.
- 萬里，1959a，〈萬里同志關於 1958 年北京市拆遷工作的檢查報告（1959 年 1 月 3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2-011-00125。Wan, Li. 1959a. *Wan Li tongzhi guanyu 1958 nian beijingshi chaiqian gongzuo de jiancha baogao (1959 nian 1 yue 31 ri)*. [Comrade Wan Li's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House Demoli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in 1958 on January 31, 1959.] Document no. 002-011-00125.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萬里，1959b，〈萬里同志關於人大會堂屋架鋼材質量不合要求嚴重影響施工進度的報告（1959 年 2 月 2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2-011-00128。Wan, Li. 1959b. *Wan Li tongzhi guanyu renda huitang wujia gangcai zhiliang buhe yaoqiu yanzhong yingxiang shigong jindu de baogao (1959 nian 2 yue 2 ri)*. [Comrade Wan Li's Report on the Serious Construction Delay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Caused by the Poor Quality of Steel and Iron on February 2, 1959.] Document no. 002-011-00128.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葉子龍，2000，《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Ye, Zi-long. 2000. *Ye Zi-long huiyilu*. [Memoir of Ye Zilong].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 賈星五，1958，〈賈星五同志關於限制在城區內開設動力在三馬力以上工廠問題的處理經過向彭真同志的報告及彭真同志的批示（1958 年 3 月 1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2-010-00114。Jia, Xing-wu. 1958. *Jia Xing-wu tongzhi guanyu xianzhi zai chengqu nei kaishe dongli zai san mali yishang gongchang wenti de chuli jingguo xiang Peng Zhen tongzhi de baogao ji Peng Zhen tongzhi de pishi (1958 nian 3 yue 11 ri)*. [Comrade Jia Xingwu's Report Submitted to Comrade Peng Zhen on the Handling of Restriction on Establishing Factory of Thress Horsepower and Beyond in the Urban Areas, and Comrade Peng Zhen's Instructions on March 11, 1958]. Document no. 002-010-00114.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 滿運來主編，2002，《北京日報社大事紀要（1949~2002）》，北京：北京日報社。Man, Yun-lai ed. 2002. *Beijing ribaoshe dashi jiyao (1949~2002)*. [The Recordings of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Beijing Daily Office (1949~2002)]. Beijing: Beijing ribaoshe.
- 趙凡，2003，《憶征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Zhao, Fan. 2003. *Yi zhengcheng*. [Remembering My Journey]. Beijing: Zhongguo nongye chubanshe.
- 趙鵬飛，2006，《雪泥鴻爪話當年（增補本）》，北京：無出版者。Zhao, Peng-fei. 2006. *Xueni hongzhao hua dangnian (zengbuben)*. [Recalling the Olden Years from the Traces of Past Events (Supplementary Edition)]. Beijing.
- 劉仁，2004，〈在市委工業交通系統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60 年 5 月 5 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0 年）》：431-447，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Liu, Ren. 2004. “Zai shiwei gongye jiaotong xitong wuji ganbu huiyi shang de jianghua tigang (1960 nian 5 yue 5 ri)”

- [Liu Ren's Speech at a Conference of Five Ranks of Party Cadres in the Sectors of Industry and Transportation on May 5, 1960]. In "*Beijingsh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1960 nian)*" [*Important Selected Documents of Beijing City in 1960*], eds. Beijingshi danganguan, and 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eijing: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 劉涌，2007，〈我的文革歲月〉，<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620/1472880.html>，查閱時間：2014/02/01。Liu, Yong. 2007. "Wo de wenge suiyue" [My Year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14).
- 鄭天翔，1989，《回憶北京十七年》，北京：北京出版社。Zheng, Tian-xiang. 1989. *Huiyi beijing shiqi nian*. [*Remember the Seventeen Years in Beijing*].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 鄭天翔，2002，〈被顛倒的事實終被顛倒過來〉，劉光人主編，《永遠難忘劉仁同志》：1-12，北京：群眾出版社。Zheng, Tian-xiang. 2002. "Bei diandao de shishi zhong bei diandao guolai" [Finally Corrected the Distorted Facts]. In "*Yongyuan nanwang Liu Ren tongzhi*" [*Unforgettable Comrade Liu Ren*], ed. Guang-ren Liu.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 鍾延麟，2014，〈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2：261-301。Chung, Yen-lin. 2014c. "Zhou Enlai yu Peng Zhen guanxi zhi yanjiu (1928~197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eng Zhen (1928~1976)]. *The Journal of History, NCCU* 42: 261-302.
- 鍾延麟，2015，〈「文革」前彭真對中共首都的管理：政治方針、領導方式和幹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58（3）：123-153。Chung, Yen-lin. 2015. "'Wenge' qian Peng Zhen dui zhonggong shoudu de guanli: zhengzhi fangzhen, lingdao fangshi he ganbu zhengce" [Peng Zhen and the PRC's Capital Governanc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rinciples, Leadership Style and Cadre Poli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3）：123-153.
- 鍾延麟，2016，〈彭真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中的角色和活動（1949~1966）〉，《中國大陸研究》，59（2）：67-101。Chung, Yen-lin. 2016. "Peng Zhen zai 'wenge' qian zhonggong duiwai guanxi zhong de jueise he huodong"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1966)].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9（2）：67-101.
- Chung, Yen-Lin. 2015.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74: 129-143.
- Potter, Pitman B. 2003.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